

理想與現實的拉鋸：中國大陸 共建新聞學院政策下教師的抗拒分析^{*}

王毓莉^{**}

中國文化大學大眾傳播學系教授

摘要

中國大陸新聞傳播改革過程中，新聞專業主義與新聞輿論監督一度受到重視，但在宣傳部門決定共建新聞學院後，大學教師教學場域產生重大變化。本文旨在檢視「共建新聞學院」政策對教師的影響，透過深度訪談法與次級資料分析法，發現共建新聞學院下，有些學院樂觀其成、多數學院基於無從選擇而採默認外，新聞學院中的教師，仍不乏努力發揮主體的積極能動性，因而對共建新聞學院要求的馬克思主義新聞觀課程，採取「外部專家策略」；在愈趨嚴苛意識形態控制的環境下，具有理想的大學教師，在啟蒙學生的理想與工作考核的現實間掙扎，從而採取「翻轉課堂策略」、「推薦參考教材策略」、「案例意義策略」、「閱讀原典策略」、和「抽象與隱晦表達策略」。

關鍵字：中國新聞傳播教育、共建新聞學院政策、抗拒策略、馬克思新聞主義觀

^{*} 本論文係作者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新時期中國的政府、公知與學子：輿論引導、轉世與翻牆運動之研究》（MOST 106-2410-H-034 -033 -MY2）之部分研究結果，作者感謝研究助理朱曉慧和林依聖參與計畫之移地研究資料蒐集。

^{**} E-mail: ylwang1022@gmail.com

投稿日期：2021 年 11 月 05 日；接受日期：2022 年 04 月 26 日

壹、研究背景與動機

中共的新聞制度沿襲自「蘇聯共產報業理論」，而追溯中國大陸的新聞教育，則始自 1918 年北京大學新聞研究會成立。中國大陸新聞專業教育改革，可分為六個階段：一、新聞專業教育的起源和初步發展時期（1912–1949）；二、新聞專業教育的調整和衰落時期（1949–1966）；三、新聞專業教育的災難時期（1966–1976）；四、新聞專業教育的恢復時期（1978–1989）；五、新聞專業教育的轉型發展和國際化時期（1990–2012）；六、新時期新聞專業教育的共建時期（2012 年迄今）（王毓莉，2021）。

自從 1978 年底改革開放政策實施後，中國大陸採取對內市場化和對外國際化接軌發展，直到 1989 年 6 月 4 日八九民運時，實務界與學術界要求新聞自由的聲浪，達到最高峰，然而在運動被鎮壓後，中國大陸的各項改革措施暫緩。直到 1992 年鄧小平南巡後，確立了進一步改革開放的方向，中國大陸的高校改革也隨之展開，1995 年底「211 工程」經國務院批准後正式啟動，重點建設 100 所左右的高等學校和一批重點學科的建設工程。1999 年，時任國家主席江澤民在慶祝北京大學建校一百周年大會上向全世界宣告：「爲了實現現代化，我國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進水準的一流大學。」據此國務院批准教育部《面向 21 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985 工程」正式啟動建設，中央政府確定 39 所大學爲「985 工程」重點建設高校，企圖創建世界一流大學和高水準大學（中國留學社，n.d.）。

根據中共 2000 年《國務院關於進一步調整國務院部門（單位）所屬學校管理體制和佈局結構的決定》，新聞傳播教育從過去「部門辦學」轉變爲「中央與地方共建，以地方管理為主」的發展模式（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2000 年 2 月 12 日），全中國各地的新聞院校，紛紛建立新聞傳播學院。

自 1990 年代末期，中國大陸新聞教育學界探討的議題，包含反思中國大陸新聞教育的重「術」輕「學」、本位化與非人文化等弊端（單波，1998），吳廷俊（2002）一文彙整，西方的「傳播學」被導入中國大陸，將「資訊」、「媒介」與「受眾」等核心概念，引入中國新聞教育理念、途徑與課程改革中。中國大陸的國際傳播學者李希光（2009）歸納整理中國新聞教育的問題點在於供多於求、課程和專業設置不對口，並借鑒美國模式、法國模式、英國和德國模式、拉美模式，探討中國新聞教育走向；陳昌鳳、王宇

琦 (2015) 亦以美國新聞教育發展為考察對象，探索中國新聞教育路徑。

伴隨著 1990 年代中國大陸的高教改革走向擴張、大眾化、普及化與國際化發展的背景下，中國大陸的新聞傳播產業改革也同步進行了商業化與市場化改革，1987 年中共第十三大報告正式文件中，首次使用了「輿論監督」的說法，傳統中共對於新聞傳媒的內容，主要以正面宣傳為主，然而傳媒在產業改革的自負盈虧商業經營壓力下，紛紛開始尋求具有市場性的內容，而新聞輿論監督類型報導與欄目，對於打擊貪腐與監督不法，受到閱聽眾的歡迎。儘管中國大陸的新聞輿論監督有別於西方的調查性新聞報導，但由於其一方面符合政治經濟環境變遷下當權者對於新聞媒介的政治需求、另一方面也符合傳媒自身改革下對於內容市場化的需求，自然有了生存的政治經濟條件 (王毓莉, 2008)。

由於以新聞輿論監督掛帥的市場化媒體蓬勃發展，新聞學院中也同時引進了不少海歸派學者，藉由新聞專業主義的學院訓練，培養未來的實務業人才。當時不少有新聞理想的新聞學院學生畢業後的第一志願，都從中央級的黨媒，轉為擅長新聞輿論監督的市場化媒體。雖然一項針對 2008 年和 2012 年北京和上海研究中國新聞教育中的意識形態發現，政府、教師和學生針對官方意識形態的協商過程，證實了即使在中國大陸的媒體市場化時期，官方的影響力，在新聞學教育中依然非常突出。不過，此時期的新聞教育工作者呈現的是既不公然破壞、也不積極提升官方意識形態 (Repnikova, 2017)，顯見尚有喘息空間。

然而，時序轉換至 2012 年 11 月「習李體制」就任後，展開了對於意識形態領域的全面整肅。2013 年 8 月 19 日甫上任的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發表重要講話指出：

黨校、幹部學院、社會科學院、高校、理論學習中心組等都要把馬克思主義作為必修課，成為馬克思主義學習、研究、宣傳的重要陣地 (人民網, 2013 年 8 月 21 日)。

在新聞實務界則發生，以新聞輿論監督指標性的南方報業傳媒集團在 2013 年《南方周末》新年獻詞事件中，被廣東省委宣傳部新聞處強打壓，將原先標題「中國夢，夢之難」，修改為「追夢」，引起該報編採人員不滿示威抗議，但終究被打壓。2014 年的南方周末事件中被全面性殲滅後，2016 年 2 月，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訪視《人民日報》、《新華社》、中央電視台，

央視主動打出「央視姓黨，絕對忠誠，請您檢閱」標語。同日「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座談會」上習近平強調：

必須把政治方向擺在第一位，牢牢堅持黨性原則，牢牢堅持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牢牢堅持正確輿論導向，牢牢堅持正面宣傳為主（桑普，2016年2月27日）。

換言之，黨媒必須姓黨，整個新聞傳播產業領域的言論空間受到緊縮（桑普，2016年2月27日）。

回顧中國大陸新聞教育史，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於1986年成立輿論研究所，成為中國大陸第一個從事民意調查的機構，企圖作為引進西方思想，探索與中國社會相結合的傳播學教育發展方向（劉海龍等人，2021）。而復旦大學新聞學院的李良榮教授也曾在1990年代，提出新聞事業跨上層建築與經濟活動的雙重屬性，引起媒體是否具商品性之爭論，最終獲得理論與實務界的肯定（李良榮、周玉橋，2021），不過，時序迄今該學院亦須「對國家政策高度回應，服務於國家發展大局」（同上引，頁148），在課程上開設「馬克思主義新聞思想」核心課程與配合「一帶一路政策」進行國際傳播的發展與招生策略。

新聞實務上，西方新聞專業義理強調新聞媒體與政府「準對立」監督關係的調查性新聞報導，中國大陸則也曾倡導「具中國特色新聞自由」的新聞輿論監督報導發展，取得不錯的成效（王毓莉，2010）。但新聞教育則是從原本可借鑑西方新聞傳播教育的專業發展，進入到新時期新聞學院必須被宣傳部門共建的狀態。

2013年12月，中宣部、教育部聯合印發《關於地方黨委宣傳部門與高等學校共建新聞學院的意見》，在上海復旦大學召開，全面加速部校共建工作的推進，高等新聞教育被認為具高度意識形態屬性，須通過共建工作將馬克思主義新聞觀，作為首要任務，全面融入新聞人才培養過程的每個環節（侯月娟，2016）。

截至2018年8月，根據公開可查的報導資料，中國大陸全國共有120個各類部校共建新聞學院單位、項目，基本覆蓋了31個省（市、區）。其中廣西共建了12所、北京有11所、浙江9所、上海6所、貴州、吉林、遼寧、江西、四川各5所，其餘各省各有1-4所（馬星宇、周宗龍，2018年8月29日）。

檢視中國大陸內部對於「共建新聞學院」的相關研究，為數不少，主要以「功能性」途徑為主，探討要求地方黨委宣傳部門及中央主要新聞單位，與當地的高校共建新聞學院的政策，以及闡述共建對於新聞學院發展的助益與推動成效（王江濤，2016；杜駿飛，2017；沈正賦，2019；侯月娟，2016）。然而，敢於提出不同爭論者點出，共建在實際推廣過程中遭遇「價值悖論」，如湖北省委宣傳部與武漢大學共建新聞學院的過程中，對共建真正的主旨是「培養人才」或是「服務行政」產生質疑（王敏，2017）。該文指出，「部校共建」是兩個部門的合作，一個屬於行政部門，具有決策治理的職能；另一個屬於教育部門，以教書育人為職責，雙方價值取向和利益考量，其實不盡相同。由於作者身在中國大陸，也未能再往下展開其間衝突價值的細節描繪。

Xu (2018) 強調，共建新聞學院政策乃中共企圖由高度商業化和數位化的媒體環境中，提高意識形態教育的控制；王毓莉 (2021) 將共建新聞學院模式分類為：「復旦大學模式」、「中國政法模式」、「廣東暨南模式」、「中西部學校模式」，並發現共建制度的實行，「人」的影響因素比「制度設計」的因素更大。在習近平總書記上任之後，共建執行的範圍有逐漸拓寬的趨勢，不過此一政策，至今尚未達到全面共建，是各地方尚未有足夠的資源，進行更大範圍的推動。因此，中國大陸「共建新聞學院政策」的執行，充滿了「因地制宜」與「因領導而異」的狀態。

中國大陸的言論尺度正處於大倒退時期，隨著中共中央要求宣傳部門「共建新聞學院」後，中國的新聞學院正處於陣痛期，在院領導不得不接受政策的情況下，大學教師作為行動者的主體，在此期間的掙扎和企圖抗拒，更顯得彌足珍貴。本研究企圖考察被共建的中國大陸重點高校的新聞學院中，面對共建學院政策下，趨緊的意識形態控制下，對於馬克思主義新聞觀融入新聞教育要求的做法，以及教師對相關意識形態控制的馴服與抗拒策略。

貳、文獻探討

習李體制上路後，2013 年一份名為《關於當前意識形態領域情況的通報》（簡稱「九號檔」）在中共黨內地師級官員範圍內傳達，披露「七不講」：要求不能講普世價值、新聞自由、公民社會、公民權力、黨的歷史錯誤、權

貴資產階級和司法獨立。同年 5 月 4 日公佈「加強高校青年教師思想政治工作意見」（簡稱「意見」）指出：

少數青年教師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職業情感與職業道德淡化……不能為人師表，在有關各級加強領導和管控之外，要求努力提高青年教師政治理論素養，進一步增強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認同、政治認同、情感認同，堅定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自覺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堅持正確政治方向。加強中國夢的宣傳教育，組織青年教師深入學習領會中國夢的精神實質，凝聚起實現中國夢的強大精神力量（BBC 中文網，2013 年 5 月 28 日）。

2013 年 8 月 19 日至 20 日在北京召開的「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中，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強調：

要深入開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宣傳教育，……要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積極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質，培育知榮辱、講正氣、作奉獻、促和諧的良好風尚（博訊新聞網，2013 年 11 月 4 日）。

該項談話後，一份名為〈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的講話精神傳達提綱〉在網路上流傳強調，所有宣傳思想部門和單位，及宣傳思想戰線上的所有黨員、幹部，都要旗幟鮮明堅持黨性原則。黨性原則不僅要講，而且要大張旗鼓講、理直氣壯講、堅持不懈講，不要躲躲閃閃、含糊其辭（博訊新聞網，2013 年 11 月 4 日）。

顯見自改革開放時期的相對以新聞專業為發展方向的新聞傳播教育，到了新時期，開始迴轉重申黨性與意識形態教育。以下檢視與本文相關的文化霸權與意識形態相關理論，以及馴服與抗拒理論。

一、文化霸權、意識形態與知識分子

義大利學者 Antonio Gramsci (1891–1937) 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重要代表人物，他以 32 本《獄中札記》(*Quaderni del carcere*) 完成了「文化霸權」理論 (cultural hegemony) 的思考和探索，是一套解釋資本主義社會的統治

階級，如何實現並維持其統治的理論。任何政治霸權階段都是經過文化及意識形態的不斷抗爭和妥協而致，解釋文化霸權的過程，其關鍵點即是對意識形態的解釋，Gramsci 將社會形態分為「政治社會」(political society) 跟「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前者代表的是國家統治中施以壓迫性的單位，由各種壓制性國家機器組成，例如軍隊、員警、司法單位；後者代表的是一般的民間團體，以文化霸權的傳播與教導為主，如教育機構、大眾傳播、宗教。而國家的組成是由政治社會和市民社會組織起的 (Gramsci, 1971)，政治社會代表暴力與強制，而市民社會代表的是從經濟領域獨立出來的社會輿論與意識形態領域 (于文秀, 2013)，雖然國家體系是由政治社會的體系控制，但要維持一般社會的秩序，市民社會才是關鍵點 (張錦華, 2010；譚光鼎, 1998)。

在具有高度民主程度的資本主義社會中，統治手段不依靠暴力，而是靠宣傳，統治階級將通過知識與道德上的領導 (Gramsci, 1971)，使民眾認同進而達到其目的，西方資本主義階級讓市民社會成為國家統治的延伸，使得文化霸權得以在市民社會進行意識形態的運作，Gramsci 認為這便是強制力量所保障的霸權 (李光榮, 2008)。

國家的領導若無法對民間社會產生道德共識及文化知識的說服力，霸權的維繫就會相當危險。因此執政者為了有效統治市民社會以及化解對抗，必會設法掌握市民社會，將其權力滲透到各民間團體中 (張錦華, 2010)。而政府為維繫霸權體系的基本利益，經常是以抗爭、溝通、妥協的方式下不斷轉換對於意識形態的共識，張錦華 (同上引) 認為 Gramsci 的霸權理論就是一個不斷解構—重構的過程 (disarticulation-rearticulation)，透過社會上不同意義的概念分解重組，形成一套有機的意識形態 (organic ideology)，總結來說，文化爭霸的精髓在於統治階級為鞏固其統治地位而從事的意識形態過程。而統治階級可能是以顯性或是隱性的方式，控制市民社會，並將意識形態滲透至市民社會中。鄭文俊 (2001) 指出意識形態可視為一種動員式的信念體系，「文化霸權」為意識形態具體制度化的表現。

意識形態理論來自於法國學者 Althusser，承襲自 Gramsci 和馬克思主義的思想，並將馬克思主義的上層國家統治結構分為「壓制性國家機器」(Repressive State Apparatus, 簡稱 RSAs) 和「意識形態國家機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 簡稱 ISAs)，前者為軍隊、員警、法律等系統，後者則包括了各種意識形態、教育、宗教等組織體系 (Althusser, 1971)。前者為意識

形態國家機器創造了一個空間，使得統治階層的意識形態得以在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中實現（孫竟陽，2014；張錦華，2010）。

基本上 Althusser 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理論，承接了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思想，馬克思主義將經濟基礎反映在意識形態與上層建築政治複雜的關係之間，其意識形態皆是佔有統治階級的思想，構成了現存社會生產關係的一部份，馬克思與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書中，將意識形態解釋成「虛假的意識」（false consciousness），而這是為了使人民認同現存的社會制度，合理化資產階級統治的手段（王瑞鎰，2005；孫竟陽，2014）。

由於 Gramsci 認為所有霸權的關係都必須是一種教育關係（Gramsci, 1971），霸權在意識形態中運作，其主要運作者便是知識份子，所以他將知識份子分為「傳統知識份子」（traditional intellectuals）與「有機知識份子」（organic intellectuals），前者也就是社會上一般認定的知識份子，例如學者、藝術家等，他們是獨立於社會團體之外的並具有自主性，是先前經濟結構下所遺留的，但 Gramsci 認為沒有任何知識份子能夠真正離開其他階級並獨立著；後者是指與社會各階層密切並自覺地發揮組織和領導作用的知識份子，他們是市民社會的組織者和霸權行使者（于文秀，2013）。

資本社會中的統治階級與勞動階級的知識份子，兩方經常在市民社會中進行領導權的爭奪，即統治與被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鬥爭。由於 Gramsci 和 Althusser 皆強調在社會既有的結構下，人們還是保有相對自主性（Althusser, 1971），因此 Gramsci 進一步解釋社會上各階級都有知識份子（Gramsci, 1971），當統治階級企圖從事意識形態的霸權時，被統治階級也會動員有機知識份子進行抗爭（張錦華，2010），也就是說，無產階級知識份子的任務，即在通過市民社會中進行知識和道德的改革工作，來改造與批判地吸收代表舊社會及資產階級傳統的知識份子，從而抵消或侵蝕他們對自己的文化和意識形態的傳播，使群眾獲得批判的革命思想意識（余超文，2009）。

關於文化霸權和意識型態主題的中國在地化研究，除了純粹以爬梳原典核心概念，闡述 Gramsci 基於當時時代背景中資本主義統治階級以「統治」和「認同」行使權力運作外，亦提出無產階級在此其中，如何透過以歷史集團或知識份子角度，爭奪意識形態的領導權（仰海峰，2006；余超文，2009；張羽佳，2010），屬於忠於原典的研究學派。

另外一派的研究途徑，則是跳過時空和制度的細描，並且將知識份子的角色相對弱化為可被宰制的個體，直接援引 Gramsci 的文化霸權論，主張借

鑒於加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培育與壯大中國的市民社會（李玉華等人，2011）；以 Gramsci 文化領導權理論，提醒不僅只要掌握好意識形態工作領導權，更要打好意識形態工作的「陣地戰」，充分發揮有機知識份子教育宣傳的作用，通過思想政治教育培養知識份子（吳璽，2018；魯霖、盛邦躍，2010），屬於理論為用派。

本研究聚焦探討大學場域中的知識分子對於宣傳部門共建的抗拒策略，屬於「忠於理論派」少見的實際動態過程分析，更可以凸顯前述「理論為用派」只看到知識分子維繫既有意識形態的盲點。

早在 2001 年，作為中國共建新聞學院的先行者，上海市委宣傳部就與復旦大學簽署了共建協議，在其新聞學院設立院務委員會。上海市委常委、宣傳部長兼任主任，相關負責人以及業界知名人士擔任委員，負責制定學院發展規劃等重大事宜。雙方在教師掛職鍛煉、記者編輯授課、學生實習就業等方面創新共建模式（鄭海鷗、王珏，2014 年 9 月 16 日）。為貫徹中央領導指示精神，2013 年 12 月，中宣部、教育部聯合印發《關於地方黨委宣傳部門與高等學校共建新聞學院的意見》，在上海復旦大學召開現場會，全面推進部校共建工作，先行試點 10 所高校（侯月娟，2016）。

根據資料顯示，2014-2016 年為高峰期，陸續有：中國人民大學、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海南師範大學文學院、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吉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重慶師範大學、復旦大學、鄭州大學、湖南師範大學、廣西大學、清華大學、西北師範大學、蘭州大學、杭州師範大學、中國海洋大學、新疆大學、安徽師範大學傳媒學院、中國政法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寧夏大學、山東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等共建學院。

2016 年習近平在全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強調：

要堅持把立德樹人作為中心環節，把思想政治工作貫穿教育教學全過程，實現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開創我國高等教育事業發展新局面（新華社，2016 年 12 月 8 日）。

而教育部長陳寶生則提出：「敵對勢力對我們的滲透首先選定的是我們教育系統，是校園。」（鳳凰新聞，2016 年 12 月 10 日）所以他強調要加強黨對教育系統意識形態的領導。但這也引起一些公知評論反彈指出，大學是孕育創新者與批判者的大本營，而大學教授、學者是引領社會發展的推手，

所以政府任何想要統一人們思想和言論的社會，便會對這些引領思想和探究知識的教授們下手，讓他們只有一種聲音，將教授們當成一種只會回答標準答案的機器（宋石男，2016年12月11日；喬木，2016年12月11日）。

從中國教育部與宣傳部門，企圖以共建學院或創建研究基地的作為來看，除了政治上的霸權宰制外，透過實際經費補助來控制高校對於政治意識形態的臣服，才是背後的邏輯。共建新聞學院政策中，最具體的展現是對於要求馬克思主義新聞觀融入新聞教育的要求，因此，本文企圖考察在共建新聞學院的發展下，學院如何面對此一要求？

二、馴服與抗拒策略

Foucault 對於權力的觀察分析指出，有權力就有反抗。正因如此，對於權力來說，反抗並不是外在的，權力關係只有依據眾多的抵抗點才能存在。在權力網絡中，這些抵抗點無所不在，同時，不存在著一種關鍵的抵抗點，而是多種抵抗點。確切的說，反抗只存在於權力關係的戰略範圍之內，而反抗點的分佈穿過社會上各個層次和所有個人（Foucault, 1978 / 尚衡譯，1992）。

關於中國大陸的新聞教育發展，北京大學新聞系長久居於新聞科系第一志願。此與蔡元培先生（1868–1940）於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學校長時期，提倡「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校風，推行教育改革，開學術自由之風，有重要的關係。此舉也使北大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中心、五四運動的策源地。而該校所奠定下的新聞科系典範，也大大影響著整個新聞教育體系。

本文認為雖然黨國機器從未放棄透過教育體系灌輸意識形態，然而屬於大學校園中被定義為知識份子的教師，儘管在行政位階上屬於被宰制的地位，但仍應有其主體能動性。

耶魯大學教授 James C. Scott 以「弱者的武器」描述農民反抗的日常形式，分析「權力」的運作，他認為支配者從未絕對控制整個舞臺，在權力運作的網絡中仍有縫隙。農民運動的抗拒策略，是避免公開的與權威結構產生衝突，但仍可達成抗拒目的（Scott, 1990）。本文擬援用此一架構，觀察「共建新聞學院」政策的權力行使，以及大學教師的馴服與抗拒。

Scott (1990) 將從屬者與統治者的互動，區分為「公開文本」（public transcript）和「隱藏文本」（hidden transcript）。他認為權力越不平衡，「公

開文本」越容易接近刻板印象，他認為若只觀察支配者與從屬者間「公開文本」，很容易落入霸權理論（hegemony）所主張，受支配者乃是受到支配意識形態洗腦，因而產生志願性的服從現象。由於 Scott 不相信「公開文本」是權力交鋒的全貌，所以他提出了「隱藏文本」的概念，他認為如果「公開文本」是支配者與被支配者在舞臺上的表演，那麼「隱藏文本」就是發生在幕後的論述與行動，而且此部分是權力所有者，無法直接觀察到的（Scott，同上引）。

他認為公開文本和隱藏文本之間，是不斷鬥爭的區域，而非一面實牆。不過，Scott 也提出，這並不是說公開的言行便是虛假的，而隱密的言行才是真的，更重要的是研究兩者之間如何互相界定、交互滲透與鬥爭的過程。

Repnikova（2017）雖然提出儘管提出過去中國官方透過各種管制手段，企圖壓制大學師生，但是教師與學生仍然不斷地對中國政黨的意識形態控制進行抗爭。另一項研究（王毓莉，2021）指出，被共建的新聞教育，呈現新聞專業與政治力的波段拉鋸，「專業新聞學教育」曾被重視，目前更重視「政策新聞學教育」。主導學院發展方向可分成三種：「宣傳單位主導模式」、「學院主導模式」、「雙頭領導模式」。

然而上述的研究，較缺乏對於身處共建制度中被宰制象的探查與細描，無法具體勾勒目前被共建新聞學院師生面臨的實際問題與應對策略。因此，本文企圖考察在共建新聞學院的政策下，被共建新聞學院師生的抗拒策略。

參、研究方法與問題

相較於先前王毓莉（2021）〈中國大陸新聞傳播教育發展之新方向：對於共建新聞學院的考察〉一文的鉅觀考察，本文無意重複探討共建機制問題，因此本文聚焦新聞學院中「教師」角色的微觀層面，期望洞察在該政策下，教師的因應策略與抗拒的可能性。

由於研究關切的核心是教師對於共建政策的「抗拒」，屬於相對高敏感性議題，除了中國大陸內部的學者不可能處理此一命題外，對於境外學者大規模調查方法取得所有「被共建」新聞學院的資料、比較「被共建」和「非共建」新聞學院的影響性，亦有所限制。然而本文研究關懷目標，是在新聞學院中任教和從事研究的教師，在面對此一政策下，若無意順從政策主流命題的教師，是否能夠有所選擇？及其可能的抗拒策略為何？

再者，由於各校執行「共建新聞學院」的內涵迥異，限於研究篇幅無法做全面性探討，本文將僅將研究範圍設定於考察在共建新聞學院的發展下，學院如何面對馬克思主義新聞觀融入新聞教育的要求？其次，觀察對應此一政策下，共建新聞學院教師的馴服與抗拒策略。

研究問題一：馬克思主義新聞觀融入新聞教育的政策與推展為何？

研究問題二：對於共建新聞學院政策教師的馴服狀況與抗拒策略為何？

因此，本研究採取「次級資料分析法」和「深度訪談法」。主因在於中國大陸採取共建新聞學院的校系單位，超過 120 個，基於研究時間與人力，無法採取普查，且因各校系的作法有所差異，乃以「次級資料分析法」，蒐集各校教師發表於期刊的各校共建等相關文獻，予以補充。

本研究採取「深度訪談法」，以滾雪球方式，於 2018 年 11 月 9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 日，在中國大陸的三個城市（南京、上海、北京）和臺灣（研究對象赴台期間），總共成功訪談 18 位中國大陸被共建新聞學院的行政主管、教授，以及 2 位就讀碩博士研究生，共 20 人次（詳見表 1）。¹

肆、馬克思主義新聞觀融入新聞教育的政策與推展

共建新聞學院政策推行中，部分新聞學院對共建新聞學院的政策，給予積極的參與及主動的配合，因為基於利益上的考量，可以獲得項目經費、硬體大樓建設、科研上的合作、媒體掛職制度²的執行及教學與實習名額上的保障。

然而，本文更關注的是新聞傳播學院被宣傳部門共建後，在意識形態面向上的影響，首先是馬克思主義新聞觀（後簡稱「馬新觀」）需要進一步融入新聞教育的要求，最令大學教授們感到困惑。

原先馬克思主義相關課程，即已被中國大陸的高校教育安排在思想政治

1 為保護受訪者個人隱私，意見採匿名處理，受訪者之編號，乃以受訪者本名的姓氏筆畫順序排列。受訪對象中包括當時已經被共建新聞學院的行政主管和教授，藉由行政和教職視角觀察此一政策的影響，至於碩博士生則在於從學生角度觀察學院的轉變與學生具體感受的影響。受訪者所表達的意見不僅對於本學院的洞察，也包括對於同業其他學校的比較觀察。

2 為鼓勵學界與業界的交流融合，提供更多機會讓沒有實際工作經驗的學校教師到業界掛職鍛煉，了解一線的運作。少數學院教師深度參與、多數偏向表面性的參與接觸。大部分的教師在掛職期間，日常教學不停，課堂時數不減少，教師需要兩邊同時兼顧。

表 1：受訪對象與背景

訪談對象	身分別	訪談時間
S1	學者 1	2018/11/14
S2	學者 2	2018/11/15
S3	碩博士生 1	2018/11/11
S4	學者 3	2018/11/13
S5	學者 4	2018/11/16
S6	學者 5	2018/11/17
S7	學者 6	2018/11/09
S8	學院主管 1	2018/11/13
S9	學者 7	2018/11/10
S10	學者 8	2018/11/13
S11	碩博士生 2	2018/11/09
S12	學院主管 2	2018/11/11
S13	學者 9	2019/12/03
S14	學院主管 3	2018/11/15
S15	學者 10	2018/11/17
S16	學者 11	2018/11/09
S17	學院主管 4	2018/11/17
S18	學者 12	2018/11/11
S19	學者 13	2018/11/16
S20	學者 14	2018/11/16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課程中，不少中國的政治領域學者提出，為了更好地完成黨的十九大提出的事業和工程，高校思想政治課理論課教師，應用學生歡迎的方式貫徹黨的大政方針。思政課教師提升意識形態話語權，有助於讓大學生理解及認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體系、制度是符合中國歷史傳統和具體國情（張永遠，2019；韓剛等人，2019）。由於馬克思主義是意識形態的主旋律，於是共建新聞學院政策提出後，各高校被要求「馬新觀」需要當成「主教材」發展，並且要求融入新聞學院的「各科目」教材中。

新聞學院的教師們產生的困惑在於，如何闡釋馬克思主義新聞觀？如何

將馬新觀與具體新聞實踐做銜接？又，如何將馬新觀融入新聞傳播的各個科目中？例如馬克思曾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著作編譯局譯，1961）指出，報刊按其使命來說，是社會的捍衛者，是針對當權者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無處不在的耳目，是熱情維護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萬應的喉舌。原始的馬新觀並不排斥新聞批評和後來中國大陸發展的新聞輿論監督，歷屆中共領導人亦肯定此一理念，³ 形成了市場化媒體中新聞輿論監督的百花齊放現象，此其中又以廣東的南方報業集團被視為最佳典範，直到2012年的《南方周末》新年獻詞發生為止。

綜觀中國大陸各高校，皆使用高等教育出版社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後簡稱「馬工程」）教材。「馬工程」專案自2004年4月正式啟動，其重要建設目標之一，為有目的、有組織、有計劃地編寫139種覆蓋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馬克思主義理論、哲學、新聞學、政治學等哲學社會科學專業的基礎理論課程和專業主幹課程教材（湯廣花，2019年8月8日）。

共建新聞學院政策實施後，為了進一步將馬克思主義新聞觀付諸實踐，教育部、中共中央宣傳部於2018年發佈《關於提高高校新聞傳播人才培養能力實施卓越新聞傳播人才教育培養計劃2.0的意見》，要求教師以言傳身教帶動學生樹立正確的新聞觀，為新時代新聞傳播人才打牢思想基礎。各個學院皆被要求將馬新觀的思想政治教育貫穿到每一個課程當中，進而影響學生的思想，強調馬新觀的重要性（沈正賦，2019）。

然而中國大陸新聞學門領域中，真正主要研究馬克思主義新聞思想的學者並不多，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陳力丹，長期投入馬克思主義，出版論著11本相關著作，其中包括《精神交往論—馬克思恩格斯的傳播觀》（1993）、《馬克思主義新聞思想概論》（2003）、《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思想體系》（2006）、《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2008）、《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論新聞》（2009）、《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教程》（2011、2015）等。是少數全心於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學者，從馬克思、恩格斯原典去理解其新聞觀點，為馬新觀提供了基礎性研究素材。

由於各個高校尚未有統一的馬新觀教材，有些學校開始組織團隊編寫馬新觀教材，有些學校使用上述陳力丹教授的人大版、童兵教授的復旦版《馬

3 鄧小平在黨的十三大報告中，首次以「輿論監督」取代了傳統「報紙批評」；江澤民在十五大報告中強調，共產黨的權力是人民賦予的，一切幹部都是人民的公僕，必須受到人民與法律的監督，他提出要把黨內監督、法律監督、群眾監督結合起來，發揮輿論監督的作用；到了胡錦濤時期，市場化媒體呈現蓬勃發展。

克思主義新聞觀讀本》(童兵主編, 2016)、丁柏銓教授的南大版《馬克思主義新聞觀: 理論與實踐》(丁柏銓、雙傳學主編, 2016) 和清華的劉建明教授版《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理論基礎》(劉建明主編, 2009)。中國傳媒大學新聞傳播學部則沒有使用馬新觀教材, 該學院把中國新聞獲獎的作品進行梳理, 製成馬新觀案例教材 (S19)。

除了上述高校剛巧有出版馬新觀教科書的資深教授, 擔任授課外, 由於馬新觀課程的內容具有一定深度, 學院中青年教師擔心難以妥當地詮釋及講授馬新觀, 一般不太敢開立講授馬新觀課程, 因此大部分高校以資深教授負責為主 (S2)。

不少新聞學院會由資深教師開課, 但是以講座形式進行, 例如北京師範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由執行院長喻國明開設「馬克思主義新聞觀與中國國情」, 該課程主要以外聘教師來授課, 外聘教師包括對馬新觀本身有研究學者或是共建單位中具有理論素養的從業人員 (S2、S8、S17)。華中師範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在「馬克思主義新聞觀大講堂」, 曾邀請復旦大學教授李良榮及童兵, 作為講座主講人 (華中師範大學新聞傳播學院, 2019)。

對於由不熟悉馬新觀的教授來授課, 恐怕會造成負面的影響, 因此「外部專家策略」, 被許多學院運用為避禍策略, 藉由邀請外部對馬新觀有專門研究或專著的專家學者講授, 避免犯錯而被學生舉報 (S2、S4、S8、S14)。

整體而言, 馬新觀課程還能夠以講座形式執行, 但是對於融入各科目教學的要求, 是目前最為困擾之處。大部分受訪者皆表示, 馬新觀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要滲透到新聞與傳播學院的各個專業課程當中相對困難, 有的教師甚至不懂得如何將馬新觀的概念融入每一個課程當中 (S2、S5、S8、S14)。

而《實踐中的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案例教材, 由全國 14 所高校新聞傳播院系專家學者、中央新聞單位資深編輯記者參加編寫, 收錄近 60 個新聞報導典型案例 (丁峰, 2015 年 1 月 4 日)。

不少受訪者表示, 正面表列不如提出反面事例, 才能讓學生更清楚瞭解馬新觀正確的方向。受訪者 (S6、S15) 舉了兩個例子, 《華商報》報導, 內容提及安塞區吳治保家庭裡五個孩子, 其中三人考入清華大學, 一人考入北京大學。隨後, 安塞區委書記任高飛代表區委、區政府以「耕耘家庭」的名義特別獎勵吳治保家庭, 頒發了 30 萬元人民幣作為獎勵資金 (賀秋平, 2018 年 7 月 9 日)。其次《大河報》報導, 山西呂梁高浩珍結婚, 他 11 個姐姐合資 23 萬人民幣讓他買房結婚 (大河報, 2018 年 7 月 11 日)。原先兩則

報導表現的是正向，鼓勵或是人情味的新聞報導，但是兩則新聞卻都違反中國大陸計劃生育政策，因此兩則新聞報導既不符合黨性原則，亦不屬馬克思主義新聞觀。

上述舉例多少有嘲諷之意，不少受訪者認為以馬新觀的概念編選出的案例教材引發較多爭議，將新聞實務界中的報導，強硬地說其符合或不符合馬新觀的報導方式，這樣的邏輯既有不盡合理之處，也容易產生倒因為果的問題（S6、S8、S13、S15）。

受訪者（S1）指出，馬新觀課程所使用的教材已經與馬克思主義思想原典逐漸悖離，不少教材主要講述現實面的領導人相關事跡。關於馬新觀課程的看法，受訪者 S6 和 S15 認為一切必須要回到馬恩原典的論述，而非以實用主義方式來理解認知或詮釋馬克思主義，如此一來將使得馬新觀淪為服務於統治者，而非學術性探討。

整體而言，在「共建新聞學院」政策氛圍下，馬克思主義新聞觀被「神主牌化」和「工具化」，嘴裡說著重視馬新觀，但是內涵不強調閱讀與理解馬克思原典，只強調如何讓馬新觀與黨的意志與意識型態控制做連結，所以不少學者私下表示：「無法教，不會教，也不敢教了！」因此，經由講座安排的「外部專家策略」，成為多數馬新觀課程的執行方式。

伍、共建新聞學院的馴服狀況與抗拒策略分析

關於共建學院對新聞學院帶來的影響，20 位受訪者有 7 位對於部校共建政策樂觀其成，持有正面態度（S1、S2、S8、S9、S10、S12、S18）。支持共建合作的主要原因包括獲得更多資源，經費，課題及實習名額。有些受訪者認為能夠獲得項目與課題經費（S1、S2），申請的命題可以按照自己研究的自主性（S10）；其次，亦有新聞學院發現在共建政策落實後，相較之下學院比以往更容易從校的層級爭取到內部的其他資源（S8、S18）。另一個意外的發現，受訪者提出所有權力內部都是有縫隙的，若把來自外部共建的力量當成對於一個可能獨斷的新聞學院權力核心的監督，不失為一種制衡和制肘的力量（S8）。

另外 7 位受訪者基於「實然面」無選擇機會的因素，對共建政策抱持「不反對、不支持」的態度（S5、S6、S14、S15、S17、S19、S20）。S15 指出學院領導階層對於共建單位的態度，主要考量宣傳部門委派的任務和資金

投入；然而，此類態度的師生是基於需要迎合上層的決策，其實心中並不歡迎宣傳部官員介入學院日常事務（S6）。多數受訪者認為共建雙方在管理有序，互不干涉的前提之下，獲得資源合作及加大共建力度是可以接受的（S5、S14、S19）。有的人不贊成共建的模式，但亦不否認共建實際對中國新聞院系的發展帶來益處，至少軟體、硬體建設上學院得到一定的發展（S17）。

不過，也有 4 位受訪者認為，共建學院對新聞學院帶來負面的效果（S3、S4、S7、S13）。受訪者指出，部校共建最大的問題為價值上的偏差，共建後由外部派任院長，非以學院的教學和科研的角度去考量學院的規劃，而是從市委宣傳部指派任務的角度，如何做好意識形態教育，為黨培養學生的角度來考量學院的發展（S3）。新聞輿論監督在一般正常的情况應是通過媒介進行社會治理，然而目前的情况卻反過來治理媒介。宣傳部從教育機制著手，對新聞學院進行意識形態管控，形同政治權力的黑手直接伸到大學內，如何培養學生具有獨立、批判思考、和具備新聞專業的價值觀（S1、S4、S13）。部校共建實質性的涵義和指向，對於新聞工作的要求和學院的導向，已經使得中國的新聞傳播教育產生巨大改變和價值的悖離（S3、S7）。

不管對於共建學院政策的基本態度為何？在此制度勢在必行的情況下，受訪者也指出，從最初政策具有開放性，仍允許不同闡釋的角度，後來逐漸演變成往單一的方向發展，共建政策確實對教育者造成了一定的影響（S7）。在此期間，被共建學院的教師，也發展出各種馴服與抗拒策略的生存之道。

一、研究方面的抗拒策略

對於中國大陸高校的教師而言，研究經費的來源大致分為兩個來源：學院教師申請的課題研究經費來自於（一）縱向課題：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省一級或市級政府課題，屬於官方命題；（二）橫向課題：來自企業。

其中類似臺灣科技部⁴計畫層級的中國國家社科基金，成立於 1986 年，主管機構為中宣部下之「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領導小組」。1991 年，中宣部於全國社科領導小組下設立相應的辦事機關「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專責制定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的發展方向、掌握社會科學研究訊息，以及負責社科基金的管理、籌措、審核與鑑定等業務。而在中央成立全國社科辦後，各省市、自治區（含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陸續成立相對應的地方社科

4 2022 年 7 月 22 日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科技部」改制為「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國科會）。

領導小組與地方社科辦，代為受理國家社科基金的相關業務（王信賢、鄧巧琳，2020）。

國家社科基金設有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黨史·黨建、哲學、理論經濟、應用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法學、國際問題研究、中國歷史、世界歷史、考古學、民族問題研究、宗教學、中國文學、外國文學、語言學、新聞學與傳播學、圖書館·情報與文獻學、人口學、統計學、體育學、管理學等 23 個學科規劃評審小組以及教育學、藝術學、軍事學三個單列學科。當中包括重大項目、年度項目、特別委託項目、後期資助專案、西部專案、中華學術外譯專案等六個類別，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另設有青年項目。爭取國家社科級別的研究經費補助，為中國大陸大學院校教師的最高「縱向課題」，省市級的政府命題則為其次，最後才是屬於來自企業的「橫向課題」。

國家社科基金級別研究項目的命題，是由下往上投稿的概念，最初由國家社科基金相關單位徵求題目，學者自發的將自己想做的命題提交上去，經過審核之後，最後將中選的命題以名單的方式統一公佈（S4）。不過受訪者透露，有的學者會揣摩官方的想法，提交上去的命題會加上特定關鍵詞，如「習近平」一詞，以提高申請項目的命中率（S5、S4、S14）。也有人指出，提交上去的命題含有特定關鍵詞，同時與自己的研究方向相結合，這樣取得項目的成功率更高（S14）。

受訪者指出，黨發現收買學者是最有效的辦法，就是提供高額的課題經費，比如一個十萬、二十萬人民幣的課題，有的學者因此心理動搖，進而願意執行該課題項目（S1）。如此一來，基於現實層面的考量，有的會選擇馴服，積極揣摩上意，去迎合申報成功率高的主流研究命題或是為了職稱，去執行特定的課題項目。

據此，本研究進行次級資料蒐集發現，以 2014 年至 2021 年中國大陸立項通過「國家社科基金」和「青年項目」的命題為例（全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辦公室，2021 年 9 月 24 日），2014 年通過項目名稱包含新上任領導人「習近平」名字的，為 0 件。2015 年有 2 件「國家社科基金」和 14 件「青年項目」，如：《習近平總書記關於“重構政治生態”重要論述研究》、《習近平總書記關於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重要論述研究》、《習近平總書記治國理政思想與黨的思想政治教育發展研究》、《習近平總書記對外傳播思想研究》等。2016 年有 20 件「國家社科基金」和 5 件「青年項目」，如：《習近平總書記治國理政思想的邏輯理路和戰略意蘊研究》、《習近平總書記“人類命運共同體”

思想及其對馬克思主義的新貢獻研究》、《習近平總書記關於“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特徵”重要思想研究》。2017 年有 49 件「國家社科基金」和 7 件「青年項目」，如：《習近平總書記關於意識形態工作思想的總體性研究》、《習近平總書記教育思想貫穿中小學教育教學全過程研究》、《文化自信視角下習近平總書記對毛澤東文化思想的繼承與發展研究》。2018 年有 90 件「國家社科基金」和 12 件「青年項目」，如：《習近平新時代國家治理思想研究》、《習近平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思想研究》、《習近平總書記網路空間治理思想及其實踐路徑研究》、《習近平新時代國家治理思想的內容體系、理論創新與當代價值研究》。

2019 年有 40 件「國家社科基金」和 3 件「青年項目」，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中的歷史地位研究》、《習近平關於網路強國重要論述研究》、《習近平關於新聞傳播重要論述研究》。2020 年有 29 件「國家社科基金」和 3 件「青年項目」，如：《習近平關於新時代愛國主義教育重要論述研究》、《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融入大中小學思政課一體化建設研究》、《習近平關於愛國主義教育重要論述研究》。2021 年有 27 件「國家社科基金」和 7 件「青年項目」，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話語體系研究》、《習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論體系研究》、《習近平總書記大歷史觀的豐富內涵與現實意蘊研究》。

研究發現，國家社科基金立項名單上所出現含有「習近平」一詞的研究命題數量顯著，有受訪者透露，領導人習近平自己也察覺到含有太多「習近平」關鍵詞的命題不太恰當，因此提高申報難度，讓有關命題不容易申報成功（S8），才使得數字逐漸下降。不過，整體而言，本文認為造成此一現象有兩種可能性，主要為國家政策，鼓勵大家作領導人相關研究命題；另或許是學者過度揣摩上意而出現的現象。有受訪者認為，關於習思想的研究，出現在不同的學科，如新聞思想、文學思想等，可見政權越來越走向權力集中（S13）。

王信賢、鄧巧琳（2020）針對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的研究也發現，社科基金幾乎是社會科學研究者學術榮譽最重要的選擇，學術資源完全集中於政府手中，讓此些知識分子「別無其他選擇」。故從所呈現出的「詞頻」可發現，社科基金獲補助的項目與「課題指南」高度重疊，且此部分在習近平掌政後更加明顯。

大學教師對於研究課題的選擇與研究方向，可體現教師個人部分的價值

與觀念。然而受訪者指出，上述國家社科基金的課題，對於新進的年輕教師尤其容易受到影響，他們在初入高校選擇研究領域時，考慮因素很多，主要是此一選擇，將影響他們未來評職稱、升等的時間或是難易度。而執行國家社科基金的研究命題更能加速升等，因此年輕老師不太願意接橫向課題（S5），加速了學術上的自我馴服。

不過，也有部分學者在觀念上抱持「分裂」的心態，將自己的價值隱藏在背後，前臺照常表現出符合規範的行為（S7）。此類學者傾向避開國家社科基金申請，選擇拿橫向研究課題，主因在於項目較無政治性、自選題機率比較高、核銷相對容易等（S2、S4、S9、S14）。也有部分學者趨向選擇投入偏量化或新媒體領域的研究項目，避開較敏感的研究命題（S7）。另有受訪者認為，儘管國家社科課題無法純然避開主流意識形態，如習思想相關領域（S1），但研究設計上或許能夠避開比較敏感的議題（S7）。

對於不認同的國家研究命題，有些學者會表現出：漠不關心、消極應對態度，對於和自己價值不相襯的研究主題，選擇少做或不做的方式（S1、S3、S7、S9）。

二、教學方面的抗拒策略

新聞學院作為培養新聞工作者的基礎平台，共建新聞學院的政策執行過程中，若干教育理念與指標，和原先新聞教育的理念，具有相當程度的悖離，對於教師課堂上的教學，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

特別是隨著中國大陸多所大學教師，因課堂言論而被學生舉報事件，層出不窮，山東建築學院教授鄧相超、北京師範大學古代語言學副教授史傑鵬、山東工商學院副教授李默海、重慶師範大學譚松等人，最後皆遭到校方處理，引起了學界的一番議論。廈門大學教授尤盛東課堂上的政治言論，遭學生舉報，甚至遭到開除（黃麗玲，2018年6月29日）。舉報事件被媒體報導之後，產生了明顯的寒蟬效應。尤盛東透露，有些教師得知舉報事件後，感到恐懼，不敢再發表評論（馮昭、陳家倫，2018年6月30日）。

整個中國大陸新聞教育的大環境中，原本在改革開放後，新聞專業領域尚可討論的「新聞專業主義」、「新聞自由」、「公共性」等詞彙，近幾年都成了敏感詞。不少受訪者指出，許多大學教師會認為自己無法表達清楚特定的敏感性議題或詞彙，進而限制自己的言論尺度，避免在課堂上講述（S5、

S14、S19)。有的教師甚至在課堂上，拒絕與學生講述及討論特定敏感性議題 (S9)。

共建新聞學院政策對於學院及教師教學上造成一定的影響，在不得不馴服此一政策下，也同時發展出一套抗拒策略，分別為「翻轉課堂策略」、「推薦參考教材策略」、「案例意義策略」、「閱讀原典策略」、和「抽象與隱晦表達策略」五種策略。

(一) 翻轉課堂策略

翻轉教室 (Flipped Classroom) 概念來自西方，針對的是傳統教室的改革，傳統教室以教師為中心，每節課都是由教師主導，從教師的角度思考及設計教學活動，主要以演講佔據多數課堂時間。在此模式下，學生是接受器，常孤立學習，自己練習精熟，缺乏學習指導，學習成效當然難以達到預期目標，時遭詬病，而成為教學改革的焦點。而翻轉教室課堂的提出，乃是以上課教學時間用在學生協同合作，以學習理解和問題解決等高層次能力，而不是用來做教師教學講演 (黃政傑，2014)。

而此種教學改革方式，正好可以被應用在當前中國大陸，老師可能「多說可能多錯」的教學環境中。受訪者指出「翻轉課堂」方式，使得教師在課堂上，無需扮演主要講述內容角色，可以讓學生透過指定教材的閱讀，反思書寫報告，隨後在課堂上引導學生進行不同觀點的爭論，過程中無絕對的對錯，讓學生透過論點交鋒，之後老師適當提點，做教材的吸收。例如課堂中教師指定教材，讓學生閱讀 Walter Lippmann (1889-1974) 的《公共輿論》著作，再請學生將之與中國大陸的輿論教材進行比較分析，學生自然會有所發現 (S6)。

(二) 推薦參考教材策略

改革開放政策實施後，對外開放與國際市場接軌，為重要的改革措施，因此，中國掀起英語學習熱潮。然而，2020 年中國大陸教育部門禁止小學和初中使用海外教科書，以及 2021 年被認為最國際化的城市上海，教育部門在八月份禁止當地小學舉行英語期末考試時，許多人感到震驚。官方所宣稱的理由為：中國當局正在減輕學生的學習任務，致力於減輕家庭和家長的負擔。但是仍有許多人忍不住將上海的決定，視為對英語和西方總體影響的抵制，許多人稱這種現象為「開倒車」或中國的「大躍退」 (袁莉，2021 年

9月9日)。

其實在此之前，受訪者也指出，雖然沒有正式的官方文件，但是大學也不鼓勵原版英文和翻譯書籍，尤其是在新聞傳播或政法相關學門(S5)。儘管不能將西文原著作為指定教科書，但受訪者指出，不少大學教授仍在課堂使用西文教材，僅將其列入參考書目清單，實際上還是使用中，學院高層從書面上不會發現(S4、S5、S11)。

而在羅列參考教材時，教師可以透過閱讀教材的設計與鋪排，直接或間接的隱含教授的價值體系與觀點，讓學生可以系統化學習，企圖啟蒙學生(S7)。

(三) 案例意義策略

隨著社會和校園輿論空間不斷緊縮，然而新聞傳播學院教師的教學，仍需要在此大環境下生存，傳道授業解惑的職責仍在。

受訪者(S4、S13)指出，可以根據案例與事實講述，形式上採取學術性地討論案例，通過案例推薦，表達自己的觀點。例如：在課堂上與學生分享兩部影片，電影《桃花扇》裡的男主角馮喆，他死在毛澤東思想的學習班上，被人在麻袋裡打一頓，然後在鍋爐房裡頭上吊，故事背景在文革時期。其次，話劇作品《蔣公的面子》，全劇借用抗戰背景，從歷史、權力、人性角度，揭示了知識分子面對強權時的複雜心態。受訪者認為，不需告訴學生特定口號，僅透過案例分享，就得以讓學生自行思考及瞭解案例背後所要表達的價值。

另外關於新聞學專業的核心觀念，將1999年《南方週末》的新年獻詞《總有一種力量讓我們淚流滿面》、在課堂上講述法治新聞報導時推薦已公開發表的案例，如2003年《孫志剛案》、2009年《成都女業主唐福珍自焚案》等個案，編寫入教材，引導學生自我閱讀，再進行討論(S4、S13)。

上述個案中，1999年《南方週末》的新年獻詞，主編寄語「讓無力者有力，讓悲觀者前行」，已成為《南方週末》為弱勢群體代言、奉行人文關懷的象徵性口號(溫如慧，2014年9月3日)。《孫志剛案》是原籍湖北黃岡的孫志剛被廣州市人民政府執法機關以三無人員的理由收押，被發現在一家收治收容人員的醫院死亡。之後由南方報業集團中《南方都市報》記者調查發現，他是拘禁期間被收容所員工毆打致死，全案被媒體報導後引起全國討論，最終廢除了被認為違憲之疑的收容遣送制度。《成都女業主唐福珍自焚

案》亦在網際網路上引起熱議，《南方都市報》發表社論，對地方官員暴力拆遷無視生命提出質疑。

整體而言，上述個案都是市場化媒體對於監督權力執政者的專業表現。大學教師除了講述一般課綱內容之外，採取案例討論的方式，期望提點學生自行閱讀個案背景，了解案例背後的意義，避免需要在課堂上赤裸裸表述的風險。

（四）閱讀原典策略

教師鼓勵學生閱讀馬克思原典，從原典的角度出發，啟發學生多思考、多批判及爭論，瞭解事情的全貌，而非閱讀經過曲解含義的內容教材（S15）。類似《自由主義新聞理論》課程中，教師也會安排學生閱讀許多西方古典教材，如英國著名哲學家 and 經濟學家 John Stuart Mill（1806–1873），十九世紀影響力很大的古典自由主義思想家，教師和學生再進行學術上研討，而非從政治上進行批判（S11）。

關於「新聞自由」的概念，並非完全不能碰觸。受訪者指出，可從中國憲法權利去討論，讓學生閱讀憲法權利，進而讓他們自行判斷（S4）；也可要求學生閱讀馬克思原典內容、中國歷代領導人的講話、十八大報告內容去詮釋「新聞自由」（S6）；亦可從法理上去分析，講述自由沒有絕對的自由，而是相對的自由（S2），這是一個折衷的提法。

當有些觀念不允許在課堂上直接討論，有些教師會通過理論層次高度，讓學生大量閱讀文獻，不落實到現實主義的層面探討，如讓學生研讀關於「新聞專業主義」、「公共性」等內涵的教材或文章，但是在課堂上不公開討論中國社會是否需要西方的觀念，讓學生從閱讀中體會（S16）。

至於表達言論場域的鬆緊變化，則可以要學生將當時最新的 2017 年 10 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報告原始文件，透過比較十七大、十八大的原文，自然會發現憲法人民四權：知情權、監督權、參與權、表達權，在十九大已不復見（S6、S15）。

（五）抽象與隱晦表達策略

「新聞專業主義」一詞逐漸成為敏感詞，受訪者指出會以新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角度，闡述公共領域和西方公共廣播電視體制，以學術化、歷史化的角度講述及表達個人的觀點，將客觀性、專業主義放在美國的語境底下，並

且在課堂上對學生特別強調，要從西方看待中國的角度，去思考中國社會的大層面（S5）。

亦有受訪者指出，資深教師對於詮釋「新聞專業主義」把握度更高，可將內容抽象化，從邏輯上用內涵、外延的各種分析法去詮釋分析新聞專業主義的內涵。聽得懂課程內容的學生，自然明白教師課堂上所要表達的價值觀點；而聽不懂的學生，當自行無法判斷該教師的價值取向，亦不會作出舉報的行為（S8）。

當涉及敏感詞彙時，有受訪者使用隱晦的表達策略，例如以職責、權利、義務、規範去替代說明「新聞自由」的內涵，而避免使用「新聞自由」一詞（S14）。亦有受訪者表示，曾經間接聽過中學老師，為了讓學生了解「八九民運」，但是不能直接在課堂上詮釋及討論，於是給學生關鍵字 89，讓學生們自行搜尋資料或是詢問家長，從而瞭解相關敏感議題（S7）。

不過，不少本研究受訪者仍認為課堂上還是能談敏感詞彙，他們堅持自己身為教師的職業操守，堅守底線在課堂授課，強調教師不應該受到太多因素的干擾（S1、S2、S6、S8）。

陸、研究發現與討論

共建新聞學院乃自上而下的政策，多數新聞學院領導階層在獲知能夠得到更多發展經費與資源下，採取主動向上配合，然而，在這些學院中，仍不乏具有理想性的師生，表達不滿或消極態度。例如：《光明日報》報業集團和中國政法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共建，也和北京師範大學新聞學院共建，但是只有前者在共建後被冠名為「中國政法大學光明新聞傳播學院」，也是少數中國大陸新聞學院被共建單位冠名的。

Repnikova（2017）認為中國意識形態工作的動態演變，在 2008-2012 年以來，管制的效果只算差強人意，因為教師和學生總是不斷地對黨的媒體原則進行積極的重新解讀。這種行為雖然並不能直接削弱當局的合法性，但是卻展示了官方意識形態工作僅僅建立了「形式霸權」，從而凸顯了中國調適性威權主義模式，在一定程度上的脆弱性。

本研究發現對於「共建新聞學院」政策，部分學院樂觀其成、多數人基於無從選擇而採默認外，新聞學院中的教師，仍不乏努力發揮其主體能動性，相信新聞傳播教育應培養學生具有獨立思考的能力及批判的精神，因而對共

建新聞學院要求的馬克思主義新聞觀課程，採取「外部專家策略」；對於共建可能產生的意識形態控制，採取「翻轉課堂策略」、「推薦參考教材策略」、「案例意義策略」、「閱讀原典策略」、和「抽象與隱晦表達策略」。

本文研究的行動者乃大學新聞學院中的教師，西方社會學對於知識分子的研究，通常採取三種途徑：「新階級理論」（new class），如：Dreyfusards、Julien Benda 和 Pierre Bourdieu 將知識分子當成一個不同於社會其他團體的新階級；「真實理論」（authenticity），如 Antonio Gramsci 和 Michel Foucault 將知識分子視為主要的階級界限，即他們的出身群體的代表；「相對無階級理論」（relatively class-less），如：Karl Mannheim、Edward Shils 和 Randall Collins 將知識分子視為相對無階級的，亦即能夠超越自己的族群，追求自己的理想（Kurzman & Owens, 2002）。Kurzman & Owens（同上引）指出知識分子物質條件的形象是「剩餘的榨取者」（surplus-extractors），不過他們具有相對自主，但也被無產階級化，並屈從於市場或國家的邏輯。知識分子經常在菁英主義和平均主義兩種意識形態中擺盪，這種緊張關係可能表現為反對人類統治的爭論形式、渴望話語權，從政治面向看，可能意味著獲得和使用權力以消除（他人的）權力。

相較於西方知識份子被認為是具有批判精神的人，且強調其在專業領域外的公共參與特質（陳晨、李福華，2016；張可，2020）。中國知識份子在身份界定上，並非聚焦於與社會的關係，不同於西方強調的二元對立關係，卻也非全然依附的關係，而是其與國家的互動關係（張可，同上引；張鈞智、黃錦堅，2021）。

加拿大學者 Cheek et al. (2018) 透過與中國學者合作翻譯的一系列研究，分析中國大陸自從毛澤東時期的意識形態控制，直到改革開放之後，黨國逐漸從宣傳機構，演化出「指導式公共空間」（directed public sphere），但是其遊戲規則與開放的自由主義政權截然不同，改革時期的中國，為毛澤東時代幾乎不存在的書籍、思想和資訊開發了商業市場。此外，中國也對教育進行了大量投資，並給海歸派學者提供了特權，同時也使得西方大學的「專業主義和職涯管理模式」，進入中國與舊式的「忠誠和派系模式」展開競爭。

長期從事二十世紀的中國思想史和知識分子的華東師範大學的紫江學者許紀霖指出，當國家體制和資本主義商業體制作為系統性力量，擴張到自由的公共文化空間，受控於權力和金錢的當代社會和傳統知識分子的淨土即已淪陷，身在體制內的大學教師，也在專業邏輯支配下，批判性和公共性凋零

(許紀霖，2011；轉引自陳晨、李福華，2016)。

身為中國大陸的新聞學院學者，在眾多學科中，亦算較為特殊的一群。也曾經因為新聞傳播產業商業化的需求，新聞教育邁入專業教育的轉型發展和國際化時期（1990–2012），期間經歷媒體市場化走向、網際網路崛起、新聞輿論監督與跨地區新聞輿論監督報導的出現。該時期中國的新聞學院，也大力鼓吹新聞專業主義的工作者培養。然而，2012年底「習李體制」就任後，中共中央旋即從源頭，決議由各地宣傳部門和當地的新聞學院進行共建。

此其後中國大陸一些學界研究，重提 Gramsci 知識份子論對於中國當代的啟示時，便著重於提出應運用理論從事意識形態建設，期望發揮知識份子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抵制西方意識形態入侵、從事政黨建設與聯繫群眾的作用（吳翌，2018；韓偉麗，2016）。上述的實用性推演，已悖離了 Gramsci 認為「有機知識份子」具有的相對自主性概念，而透過強制「共建新聞學院」的政策手法，亦非以抗爭、溝通、妥協的方式，不斷轉換知識份子對於意識形態的共識。此一作法對於當今霸權的維繫，能否具有絕對有效性？新時期對於知識份子的控制與改造方向與效度？值得持續研究觀察。

儘管張鈞智、黃錦堅（2021）從 2007-2019 年中國國家社科基金的文本資料，觀察國家與知識分子之間話語互動，強調即使鑲嵌在國家的限制當中，知識分子與國家的互動角色不能簡單化約為服從，同時也扮演了自主的角色。該研究認為，知識分子與國家之間的互賴和協調，可能促進威權體制的調適性治理。

然而，Hao & Guo（2016）指出政權領導進入習李體制後，中國的意識形態控制，已經使得社會中表達政治異議變得越來越困難，特別是在大學裡。該研究針對中國大陸中部某省級大學的個案研究指出，大學教授可能扮演的知識分子角色有「體制／有機」（establishment/organic），「非體制／專業」（non-establishment/professional）和「反體制／批判性」（contra-establishment/critical intellectuals）。而中國的大學教授多數扮演「體制／有機」和「非體制／專業」兩種角色，並且承擔如此的知識分子的政治身份。不過，他們也認為大學教授作為知識分子，除了能夠在遵守黨國的政策指引外，能夠有限度的發展出服從性的自主（obedient autonomy），並且平行發展出小規模有創意的異議活動，至少拒絕活在謊言中。

本研究展示大學場域中，知識分子對於宣傳部門共建新聞學院的抗拒策略，為「忠於馬克思主義理論派」，填補與貢獻場域中實際動態行為的視角

分析。至於場域中的大學校方或學院內部管理階層，對於教師抗拒策略的應對之道，誠如王毓莉（2021）發現「共建新聞學院政策」的執行，目前仍充滿了「因地制宜」與「因領導而異」的狀況。換言之，如同 Foucault 指出，有權力就有反抗，Scott 認為支配者從未絕對控制支配，權力運作的網絡中仍有縫隙（Foucault, 1978 / 尚衡譯, 1992 ; Scott, 1990），因此大學教師目前仍能在權力的縫隙中運用隱藏文本的抗拒策略。

只不過近期《紐約時報》發現，自習近平上任以來，中國已有數百所大專院校正在大規模收編學生以監視教師，甚至有計劃的在每班至少安插一名學生資訊員（赫海威，2019 年 11 月 1 日）。學生資訊員的職責為觀察教授的意識形態思想，協助剷除言行舉止不忠於習近平與中國共產黨的學校老師（蔡媣媣，2019 年 11 月 3 日）。黨對教育系統意識形態的滲透日趨嚴重，原先從大學教授著手，後再利用學生去監督教師。隨著舉報老師的案例增多，中國充斥著「告密文化」的氛圍。

本文的研究限制，在於無法針對共建新聞學院的各校，做通盤的調查，僅能就研究的立意範圍，從研究和教學視角探索研究問題。整體而言，中國大陸校園課堂的言論尺度空間確實緊縮，舉報的氛圍形成大學教師的自我約束，對於新進的教師而言，更是一大挑戰，因此也有人在同事間和師生間原本應有的學術性探討，採取噤聲策略，或者避談爭議性、敏感性的事件與話題。然而新聞教育應培養學生具有獨立思考的能力及批判的精神，若教師因為擔心受到舉報氛圍的影響，未來大學的學術自由和知識啟蒙都將大為倒退。由此凸顯本研究的價值，即是在越是艱難的環境中，中國大陸仍存有理想的大學教師，透過歸納他們如何在夾縫中夾帶教育理想的抗拒策略，了解做為行動者的中國大學教師知識分子如何在啟蒙學生的理想與工作考核的現實間掙扎？再者，隨著在大學課堂中公開發表公共或爭議性議題的風險逐漸升高，未來中國大陸新聞傳播學院的知識傳承、實務人才培養，將產生怎樣的變化，值得持續關注。

參考文獻

- BBC 中文網 (2013 年 5 月 28 日)。〈習近平新政：七不講後又有十六條〉，《BBC 中文網》。上網日期：2018 年 8 月 30 日，取自 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3/05/130528_china_thought_control_youth
- 丁柏銓、雙傳學主編 (2016)。《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理論與實踐》。江蘇人民出版社。
- 丁 峰 (2015 年 1 月 4 日)。〈實踐中的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案例教材出版〉，《新華網》。上網日期：2018 年 8 月 30 日，取自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1/04/c_1113864295.htm
- 人民網 (2013 年 8 月 21 日)。〈習近平：胸懷大局把握大勢著眼大勢，努力把宣傳思想工作做得更好〉，《人民網》。上網日期：2018 年 10 月 30 日，取自 <http://cpc.people.com.cn/n/2013/0821/c64094-22636876.html>
- 于文秀 (2013)。〈葛蘭西哲學與當代批判理論的文化轉向〉，《哲學與文化》，40 (6)：125-142。
- 大河報 (2018 年 7 月 11 日)。〈弟弟結婚：11 個親姐姐湊 23 萬幫他買房結婚〉，《大河報》。上網日期：2019 年 1 月 5 日，取自 <https://www.dahebao.cn/detail.html?newsid=1198451>
-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著作編譯局譯 (196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 中國留學社 (n. d.)。〈211 工程和 985 工程〉，《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上網日期：2020 年 8 月 30 日，取自 <https://www.chinaeducenter.com/ceduproject211.php>
-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 (2000 年 2 月 12 日)。〈國務院辦公廳轉發教育部等部門關於調整國務院部門（單位）所屬學校管理體制和佈局結構實施意見的通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上網日期：2020 年 10 月 30 日，取自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0/content_60667.htm
- 王江濤 (2016)。〈部校共建：理論實踐融合視野下的新聞教育模式創新——以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為案例〉，《西部學刊》，4：71-72。
- 王信賢、鄧巧琳 (2020)。〈壟斷性侍從主義：中國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的

- 國家社會關係》，《中國大陸研究》，63(3)：1-44。
- 王 敏 (2017)。〈「部校共建」模式下的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教育研究——以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為例〉，《教師教育論壇》，9：82-86。
- 王毓莉 (2008)。〈中國新聞輿論監督之研究——一個政治經濟角度的分析〉，《中華傳播學刊》，13：143-180。
- _____ (2010)。《具有中國特色的新聞自由：一個新聞輿論監督的考察》。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_____ (2021)。〈中國大陸新聞傳播教育發展之新方向：對於共建新聞學院的考察〉，《2020 數位傳播 - 賽博光廊暨颯心立藝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109-133。臺灣藝術大學。
- 王瑞鎰 (2005)。《後鄧時期中共政治意識型態的轉變：以三個代表為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學院行政管理碩士學程碩士論文。
- 仰海峰 (2006)。〈葛蘭西論知識份子與霸權的建構〉，《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46(6)：88-95。
- 全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辦公室 (2021年9月24日)。〈年度專案、青年專案和西部專案〉，《全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辦公室》。上網日期：2021年9月26日，取自 <http://www.nopss.gov.cn/GB/219469/431027/index.html>
- 余超文 (2009)。〈葛蘭西文化領導權思想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理論界》，9：162-163。
- 吳廷俊 (2002)。〈傳播學的導入與中國新聞教育模式改革〉，《新聞大學》，1：25-28。
- 吳 翌 (2018)。〈葛蘭西文化領導權理論對我國意識形態工作的啟示〉，《黑龍江生態工程職業學院學報》，31(4)：49-51。
- 宋石男 (2016年12月11日)。〈宋石男：作為敵對勢力的大學的三種精神〉，《四一哥微信公眾號》。上網日期：2018年8月25日，取自 <http://mp.weixin.qq.com/s/vK9LxOLA8zxFpZdzvLF07w>
- 李玉華、羅能勤、杜曉燕 (2011)。〈我國二元化政治權力結構下市民社會的興起與培育——基於葛蘭西市民社會理論的分析〉，《西安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31(6)：84-86，104。
- 李光榮 (2008)。〈解析 Antonio Gramsci 的學校教育觀點——一種建立勞動階級霸權的學校教育〉，《國立台南大學教育研究學報》，42(1)：1-16。

- 李希光 (2009)。〈中國新聞教育走向何方〉，《當代傳播》，2：4-7。
- 李良榮、周玉橋 (2021)。〈復旦師生的「好學」與「力行」：新聞傳播學的中國經驗〉，《傳播研究與實踐》，11 (2)：131-152。https://dx.doi.org/10.6123/JCRP.202107_11(2).0006
- 杜駿飛 (2017)。〈以「政產學研合作」深化部校共建——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的基本經驗〉，《新聞與寫作》，10：26-30。
- 沈正賦 (2019)。〈部校共建新聞學院 2.0 版的深度打造與發展圖景——基於《教育部 中共中央宣傳部關於提高高校新聞傳播人才培養能力實施卓越新聞傳播人才教育培養計畫 2.0 的意見》的出台與實施〉，《新聞春秋》，4：85-91。
- 尚衡譯 (1992)。《性意識史第一卷：導論》。九大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原書 Foucault, M. [1978].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 1: The will to knowledge*. Pantheon Books.)
- 侯月娟 (2016)。〈部校共建中的高端智庫建設與人才培養創新——中國政法大學光明新聞傳播學院部校共建模式探析〉，《西部學刊》，6：71-72。
- 袁 莉 (2021年9月9日)。〈「開倒車」？中國弱化英語教育意味著什麼〉，《紐約時報中文網》。上網日期：2021年9月9日，取自 https://cn.nytimes.com/china/20210909/china-english/zh-hant/
- 馬星宇、周宗龍 (2018年8月29日)。〈120家部校共建新聞學院大盤點〉。上網日期：2018年8月30日，取自 https://www.cingta.com/detail/6627
- 陳晨、李福華 (2016)。〈知識份子：大學教師的內在要求〉，《教師教育研究》，28 (2)：8-14。
- 華中師範大學新聞傳播學院 (2019)。〈學院新聞〉，《華中師範大學新聞傳播學院》。上網日期：2019年9月30日，取自 http://jc.ccnu.edu.cn/index.htm
- 陳力丹 (1993)。《精神交往論 -- 馬克思恩格斯的傳播觀》。開明出版社。
- _____ (2003)。《馬克思主義新聞思想概論》。復旦大學出版社。
- _____ (2006)。《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思想體系》。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 _____ (2008)。《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人民日報出版社。
- _____ (2009)。《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論新聞》。人民日報出版社。

- _____ (2011)。《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教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 _____ (2015)。《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教程 (第二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 孫竟陽 (2014)。《阿爾都塞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理論及其當代價值》。大連理工大學碩士論文。
- 桑 普 (2016 年 2 月 27 日)。〈當央視正名為黨視〉，《Pentoy 評台》。上網日期：2021 年 9 月 1 日，取自 <https://www.pentoy.hk/%E7%95%B6%E5%A4%AE%E8%A6%96%E6%AD%A3%E5%90%8D%E7%82%BA%E9%BB%A8%E8%A6%96/>
- 張 可 (2020)。〈當代中國知識份子研究的社會學轉向：概念、成果與分析框架〉，《社會學評論》，8 (5)：104-116。
- 張永遠 (2019)。〈高校思政課教師提升意識形態話語權問題探討〉，《焦作大學學報》，2：117-120。
- 張羽佳 (2010)。〈何種文化？誰之霸權？——從蘇聯與中國的政治實踐看葛蘭西的文化霸權理論〉，《北京行政學院學報》，2：51-55。
- 張鈞智、黃錦堅 (2021)。〈建構合意空間：當代中國大陸學術知識分子與國家的互動策略〉，《政治學報》，71：33-60。
- 張錦華 (2010)。《傳播批判理論：從解構到主體》。黎明文化。
- 許紀霖 (2011)。《中國知識分子十論》。復旦大學出版社。
- 陳昌鳳、王宇琦 (2015)。〈創新與堅守：美國經驗與新環境下國內新聞教育路徑探索〉，《國際新聞界》，7：26-35。
- 博訊新聞網 (2013 年 11 月 4 日)。〈習近平“8.19”講話傳達全文曝光，殺氣騰騰〉，《博訊新聞網》。上網日期：2018 年 8 月 29 日，取自 <http://www.boxun.com/news/gb/china/2013/11/201311042254.shtml#.Vb3SwjHvqcw>
- 喬 木 (2016 年 12 月 11 日)。〈敵對勢力對大學教授的滲透〉，《喬國公微信公眾號》。上網日期：2018 年 8 月 25 日，取自 http://mp.weixin.qq.com/s/_FvxQe9pofbMkgPPihO4Wg
- 單 波 (1998)。〈反思新聞教育〉，《新聞與傳播研究》，12：38-44。
- 湯廣花 (2019 年 8 月 8 日)。〈馬工程重點教材：推動理論創新 體現中國特色〉，《中國新聞出版廣電網》。上網日期：2019 年 9 月 3 日，取自 chinaxwcb.com/info/555094

- 童兵主編 (2016)。《馬克思主義新聞觀讀本》。復旦大學出版社。
- 賀秋平 (2018年7月9日)。〈5個娃4人考入清華北大 安塞這家庭獲獎30萬〉，《華商報》。上網日期：2019年1月5日，取自 <http://yanan.hsw.cn/system/2018/0719/18960.shtml>
- 馮昭、陳家倫 (2018年6月30日)。〈廈大教授因上課政治言論 遭解聘〉，《中央通訊社》。上網日期：2018年12月1日，取自 <https://www.cna.com.tw/news/acn/201806300112.aspx>
- 黃政傑 (2014)。〈翻轉教室的理念、問題與展望〉，《臺灣教育評論月刊》，3 (12)：161-186。
- 黃麗玲 (2018年6月29日)。〈廈大教授因言論被舉報，步入奧威爾時代恐怖？〉，《美國之音》。上網日期：2018年8月25日，取自 <https://www.voachinese.com/a/voanews-20180629-china-academic-freedom/4460096.html>
- 新華社 (2016年12月8日)。〈習近平：把思想政治工作貫穿教育教學全過程〉，《新華社》。上網日期：2018年10月1日，取自 <https://view.inews.qq.com/a/NEW2016120803397603?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
- 溫如慧 (2014年9月3日)。〈淺析《南方周末》新年獻詞的話語表達方式〉，《人民網》。上網日期：2018年8月1日，取自 <http://media.people.com.cn/BIG5/n/2014/0903/c388686-25597492.html>
- 赫海威 (2019年11月1日)。〈中國高校用「學生信息員」監督教師、消除異議〉，《紐約時報中文網》。上網日期：2019年11月1日，取自 <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91101/china-student-informers/zh-hant/>
- 鳳凰新聞 (2016年12月10日)。〈切實加強黨對教育系統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鳳凰新聞》。上網日期：2018年9月30日，取自 http://share.iclient.ifeng.com/sharenews.f?forward=1&aid=cmpp_030010050396175&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 劉建明主編 (2009)。《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理論基礎》。清華大學出版社。
- 劉海龍、秦藝丹、段世昌 (2021)。〈「學科化」與「中國化」：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傳播研究與教育史〉，《傳播研究與實踐》，11 (2)：67-94。 [https://dx.doi.org/10.6123/JCRP.202107_11\(2\).0004](https://dx.doi.org/10.6123/JCRP.202107_11(2).0004)

- 蔡媬媽 (2019 年 11 月 3 日)。〈中國「告密文化」再現〉「監視老師是我們的責任……」數百所大學部署「學生間諜」剷除「對黨不忠」教授，〈風傳媒〉。上網日期：2021 年 10 月 10 日，取自 https://www.storm.mg/article/1898593?fbclid=IwAR07wGn2TQZEBM5Q8ES0LQ8swGjy8spmCc_ZudsOmKu_Ramyt_AboK5hm9E
- 鄭文俊 (2001)。《意識形態與文化霸權對工業設計教育核心課程及教學影響之研究》。彰化師範大學工業教育研究所博士論文。
- 鄭海鷗、王珏 (2014 年 9 月 16 日)。〈下一盤新聞人才培養的好棋——部校共建新聞學院綜述〉，《人民網》。上網日期：2018 年 10 月 30 日，取自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14-09/16/nw.D110000renmrb_20140916_2-04.htm
- 魯霖、盛邦躍 (2010)。〈葛蘭西的文化領導權理與思想政治教育〉，《巢湖學院學報》，12 (5)：21-24。
- 韓剛、李新海、周振剛 (2019)。〈大學生意識形態教育工作的挑戰與對策研究〉，《哈爾濱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76-78。
- 韓偉麗 (2016)。《葛蘭西知識份子觀研究》。貴州師範大學馬克思主義發展史專業碩士論文。
- 譚光鼎 (1998)。〈社會與文化再製理論之評析〉，《教育研究集刊》，1 (40)：23-50。
- Althusser, L. (1971).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New Left Books.
- Cheek, T., Ownby, D., & Fogel, J. (2018). Mapping the intellectual public sphere in China today. *China Information*, 32(1), 107-120. <http://doi:10.1177/0920203X18759789>
- Gramsci, A. (1971).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 (Q. Hoare & G. N. Smith, Eds & trans.).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 Hao, Z., & Guo, Z. (2016). Professors as intellectuals in China: Political identities and roles in a provincial university. *The China Quarterly*, 228, 1039-1060. <http://doi:10.1017/S0305741016001442>
- Kurzman, C., & Owens, L. (2002). The Sociology of intellectual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8, 63-90. <https://doi.org/10.1146/annurev.soc.28.110601.140745>
- Repnikova, M. (2017). Thought work contested: Ideology and journalism

education i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230, 399-419.

Scott, J. C. (1990). *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 Hidden transcripts*. Yale University Press.

Xu, J. (2018). The return of ideology to China's Journalism education: The 'joint model' campaign between propaganda department and Journalism school. *Asia Pacific Media Educator*, 28(2), 176-185.

本文引用格式

王毓莉 (2023)。〈理想與現實的拉鋸：中國大陸共建新聞學院政策下教師的抗拒分析〉，〈《傳播研究與實踐》〉，13 (1)：185-220。https://dx.doi.org/10.53106/222114112023011301006

Wang, Y. L.(2023). The dilemma between ideal and reality: An analysis of teachers resistance strategies under the "joint model" policy in Mainland China's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chool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13(1), 185-220. https://dx.doi.org/10.53106/222114112023011301006 [Text in Chinese]

The Dilemma Between Ideal and Reality: An Analysis of Teachers' Resistance Strategies Under the "Joint Model" Policy in Mainland China's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chools

WANG, Yu-Li*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Mass Communication,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Abstract

During the news reform process in mainland China, the news professionalism and news supervision by public opinion were once regarded as important. However, after the propaganda department decided to adopt the "Joint Model" policy with the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chools, major changes had taken place in the educational field in universities.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influences of the "Joint Model" policy of the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chools on the university teachers in mainland China. Using in-depth interviews and the secondary data analysis, the study found that some colleges embraced the policy optimistically, but many other colleges accepted reluctantly since there were no other choices. However, under the "Joint Model" policy, some teachers still chose to actively develop resistance strategies to retain some subjectivity and agency. They adopted the "external expert strategy" in teaching the required Marxist view of journalism courses. Under the increasingly strict ideological control, teachers in universities were forced to struggle between the ideals of enlightening students and pursuing the reality of teaching KPIs. In turn, they adopted the following resistance strategies: "the flipped classroom strategy", "the recommended reading list strategy", "the case study and implication strategy", "the recommending foreign language texts strategy", and "the abstract and obscure expressions strategy."

Keywords: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in mainland China, “Joint Model” policy of the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chools, resistance strategy, the Marxist view of journalism

* E-mail: ylwang1022@gmail.com
Received: 2021.11.05; Accepted: 2022.04.26

